

April 1996

Occasional Paper No. 50



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 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

王家英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

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鳴謝

本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計劃負責籌劃進行。在資料分析及出版的過程中，香港亞太研究所沈國祥先生、司徒美華小姐和尹寶珊小姐先後給予人力的幫助，謹此致謝。

© 王家英 1996

ISBN 962-441-050-X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

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

摘 要

本研究運用電話調查的方法，先後探討了當前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民族認同，以及他們的自由主義意識，並分析了它們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十分強烈，族群自傲感很高。與此同時，他們的中國人民族認同亦相當深厚，但偏重於對民族「性格」及民族歷史文化的肯定，對當前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和對民族未來發展的信心，卻顯得有點疏離和遲疑。此外，香港人在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民族認同之間的定位亦呈現出頗為複雜的關係，一方面他們大多數的自我族群意識遠高於民族意識，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並從香港本位定位中國；另一方面卻頗願意幫助民族發展，有頗為清晰的現代民族意識和國家主權意識，以及頗願意加強香港人的中國民族教育。至於自由主義意識，香港人的表現並不太差，有超過六成的香港人認為自由人權較國家民族重要，同意西藏人、台灣人、香港人擁有自決權利的人數均分別佔總數三成半以上，而表示若條件許可，或會考慮移民者的總數也高達四成。更重要的是，香港人的自由主義意識與其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民族認同明顯存在了某種複雜而微妙的關係，那就是認同自由人權、同意族群擁有自決權利、或考慮移民者，一方面輕微呈現出較強烈的香港人自我族群認同，另一方面在中國人民族認同上則出現了顯著的弱化傾向。這結果基本上印證了過去族群／民族發展的自由主義解釋：自由主義可以成為群體意識的來源、分離主義的理據和民族主義的基礎。

引言

香港只餘下一年多的時間便會從英國殖民統治回歸中國主權。儘管類似的地區主權轉移在近代世界歷史亦出現過，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民族國家政治（politics of nation-state）的發展中，主權轉移本身並非僅止於某從屬地域空間從某一主權政府手中轉向另一主權政府手中，而且更包含在該地域空間生長居住的族群整合進新的主權國家的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之中（Kim and Dittmer, 1993:241-44），因此當中所衍生的從屬地域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與新主權國家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之間的可能矛盾與緊張，便成為從屬地域族群及新主權國家必須盡早面對和慎重研議的問題，因為一旦認識不足，處理失當，將無可避免地會造成深遠的族群關係問題，從而危害到民族國家的整合與發展。²

雖然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對民族國家的整合異常重要，而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香港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大陸亦已成定局，但有關香港人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的研究卻寥寥可數（Lau and Kuan, 1988:178-87; Lau, 1992:152-53; White and Cheng, 1993:180-90; Lee and Leung, 1995），而且大多集中於描述兩種認同各自的強弱和相互的關係，少有從較抽象的理論層次對之作出解釋。

本文旨在探討主權轉移前夕香港人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的狀況，並嘗試檢視在香港社會文化中日漸生根的自由主義意識，是否對這些認同狀況構成影響。文中的資料，主要來自一項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進行的電話問卷

調查，³ 因此除特別註明外，文中所援引的數據，均直接來自該調查的結果。

族群認同、民族認同、自由主義

認同 (identity) 這一概念初源於心理學，泛指人類面對其所存在的混沌世界時，對同／異 (identity/difference) 的一種普遍生物心理 (biopsychological) 需要與追尋，藉此建構其與世界的關係，盡量消除模糊與不確定感，使生活更有意義、更易於管理 (Erikson, 1963)。它其後被運用於多個社會科學學科 (如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而且在概念上取得大幅的擴充與發展，將心理學研究和社會學的群體互動研究貫穿連繫一起。

客觀而言，擴充與發展認同的概念內容是爲了要捕捉微觀的個體心理與宏觀社會構成一體相連的辯證現象。在微觀的個體心理層面，認同一般被認爲是人類動機與行爲恆久不變的來源，使人類確信他們有關自己的想像、認知爲真，而且不僅在他們自己的眼中看來如此，在其他他們視爲重要的社會人士 (significant others) 的眼中看來亦復如此；在宏觀社會層面，認同又是個體意義的深層文化符碼 (cultural code)，使個體在社會互動中得與普遍的社會意義發生關係 (Weigert et al., 1986:27-28)。簡言之，認同是個體通向社會群體的橋樑，一方面使個體取得情感和意義的安放場所，另一方面又使群體的秩序得到維繫和鞏固。與此同時，由於現實社會包涵著不同層次、不同功能的社會群體，因此個體的認同必然是紛繁而非單一的 (Bond, 1993)，儘管各種認同之間的關係有輕重、主從之別 (王廣武, 1994:233-64)。

在各種集體認同之中，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是極為重要的兩種，這可從世界各地經常發生的族群與族群之間和族群與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略窺一二。不過，在一般人的意識裡，族群（ethnicity）和民族（nation）往往交相運用，少有在概念上作出清晰明確的區分。其實二者的指涉，特別在社會科學領域，是有本質的差異的：族群泛指一般擁有相同血源、風俗習慣、文化價值等的社會群體，本身並不必具有獨立建國的政治意向，但民族的意思，卻除了要具有族群的社會文化特質外，還必須要以現代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為奮鬥的目標，本身表現出很強烈的國家政治意向（Smith, 1986）。換言之，一個族群並不是一個民族，但一個民族卻必然包含一個凝聚力極強的族群，並從事民族國家的追尋及建設。因此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大多認為，民族主義其實就是一個族群的政治建構過程，最終的目的自然是尋求族群疆界與政治疆界的合一（Hobsbawm, 1990:9; Gellner, 1983:1; Breuilly, 1982:3）。

無疑，就血源、文化、歷史而言，居住於香港的絕大多數市民均是廣義上的華人（Chinese），對傳統的中國（包括歷史、文化、血源、地域等各方面）多存有一定程度的原初性情懷（primordial sentiments）。然而，這種原初性情懷充其量只能構成王賡武（1994：245）所謂的歷史認同，並不完全等同於以現代民族國家為目標的民族認同。如上所說，現代民族國家雖或多或少發源於傳統族群的推動，但畢竟是一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建構，對任何傳統族群成員而言，由此政治建構所導引出的民族經驗，必然是一嶄新的經驗（Gellner, 1983; Anderson, 1983; Hobsbawm, 1990; Greenfeld, 1992; Smith, 1991）。⁴ 香港特別的地方是，在傳統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過渡之前，它已割讓了給英國，成為英國的殖民

地。此外，縱使那些經歷過中國民族主義洗禮、在一九四九年前後踏足並定居香港的華人，國共內戰的經驗，⁵也極可能使他們的民族認同展現出各種矛盾甚至破滅厭倦的心態。換言之，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經驗，迄今為止，多少是獨立於香港市民的現實意識之外，又或是因過去國共的對立對抗而扭曲不堪。總而言之，在過去的四十多年中，香港市民所經歷的政治現實，主要還是英國殖民統治，而非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雖然不斷從中國大陸流入香港的新移民，也保有一定的中國民族國家經驗，但他們在全香港的人口中只是少數，並不能代表香港市民的主流經驗。

在研究族群的形成與發展上素負盛名的學者 Benedict Anderson (1983) 曾經指出，近代族群意識形成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殖民疆界與統治，殖民疆界帶來了疆界內人民的共同空間意識，而殖民統治則形塑了新的族群歷史與經驗。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香港雖然也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但當時政治疆界的管制並不嚴厲清晰，大陸人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香港 (Endacott, 1964:4-5)。但自一九四九年之後，由於大陸移民不斷擁入，⁶造成管治困難，加上東西方冷戰格局隨著韓戰的爆發而快速浮現，香港政府於是自一九五零年開始，逐漸將過去的「開放疆界」(open border) 收緊，取而代之的是一控制較為嚴密的移民政策 (Endacott, 1964:5)，從此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便出現了一較高程度的政治區隔，香港市民也開始落地生根，後來所謂的「香港意識」或香港「文化特質」(ethos) (Baker, 1983; Lau and Kuan, 1988; Choi, 1990; Chan, 1994)，很大程度便是在一九五零年代以後慢慢形成的。從族群發展的角度看，這種「香港意識」或香港「文化特質」的浮現所突顯的，其實就是香港人作為一地域族群的形成，儘管這地域族群的成員

均來自中國大陸，對歷史的中國以至當今政治的中國有不同程度的認同。

無論如何，殖民政治疆界的清晰化與穩定化只是近代族群意識形成的一個重要外緣條件，任何烏合的社會集體（social collectivity）最終是否能發展成一具強烈自我意識的族群，甚至進而與原來所屬的大族群出現斷裂，並從自我族群意識的基礎走向新的民族認同，也就是走向政治上的民族主義運動，還需要取決於其他內部社會文化發展的配合。在眾多內部社會文化發展中，近年有一項較為學者所注意的，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

表面上，將自由主義和族群意識、民族意識的發展連繫一起，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因為前者以個體的獨立理性為基礎，強調的是個體的自由自主，而後者則高舉群體的原初性情懷及其產生的自然鏈帶（natural solidarity），認為群體具有某種超越的、不可還原為個體之總和的存在。

然而，上述自由主義與族群意識、民族意識發展看似相互矛盾對立的關係，近年頗受到學術界的質疑。Yael Tamir（1993）首先提出了自由主義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這一概念，從哲學的層次，論證了自由主義的群體基礎，並進而推論自由主義可以成為民族主義的依據，從而發展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他解釋，自由主義者雖沒有直接處理群體身份的問題，但其尋求的政治建構，卻明顯是以群體認同為基礎的，這包括自由主義國家中的公民權一般取決於族裔權和親屬權而非自由選擇；對其政府的政治效忠（只要此政府的行動中規中矩）而非選擇一個最為正義的政府；國家福利只分配給自己的公民，對其他並非自己公民的需要卻大多袖手旁觀（Tamir, 1993:117）。不僅如此，自由主義既需要在群體中體現、實踐，當群體的形成與發展建基於自由主義的理

想和價值（如對個體自由、權利的追尋與捍衛），甚至直接以自由主義的理想與價值作為集體建構的目標，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出現，便更是自然不過了（Tamir, 1993:9）。

Harry Beran（1984:24-5）便指出，民族主義的一支——分離主義（secession），其理論基礎其實就是自由主義，因為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最理想的社會是一個最接近自願結合的社會，而國家的統一也可視為自願性的結合，故此國家中部份成員要求分離，另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只要現實上可行的話，是應該得到容許的。吳乃德（1994）沿著相同的思路，並配以量化的問卷調查研究，最後亦證明，自由主義是台灣分離主義的一個重要基礎。

同樣地，Liah Greenfeld（1992）也從實證發現，美國人民族認同形成的核心基礎，並不是其傳統族群（特別是其宗主國英國）文化的特殊性質，而是其獨立建國的合法性基礎英國憲政原則。Greenfeld 指出，英國憲政的核心價值是民主和自由，其所象徵的是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而非一般族群文化所強調的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當日美國十三州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的主要訴求，便是實踐英國憲政理想，以自由主義的普遍性作為美國的立國精神，藉此否定英國殖民統治種種不平等支配的合法性。對早期的美國移民而言，美國吸引人的地方，不僅是這地方物質豐饒，也同時是它高舉民主和自由。事實上，從建國開始，民主和自由一直成為美國人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也是美國人國民教育的一項主要內容（Greenfeld, 1992:446）。

如果自由主義可以成為群體意識的來源、分離主義的理據和民族主義的基礎，在自由主義日益高漲的當今世界，可以想像，其對族群與族群之間的關係、族群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的影響應是異常巨大的。Jürgen

Habermas (1994) 便認為，自由主義積極建立的民主公民 (democratic citizenship)，已日益成為現代民族認同的其中一項核心價值，一方面對傳統的、以集體主義為導向的民族認同產生了嚴重的衝擊（如前蘇聯），另一方面又催生出新的民族整合（如歐共體作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浮現）。

英國在香港的統治雖非民主政治，但經濟上採取的自由貿易主義 (*laissez-faire*) 和社會文化上推行的盡量不干預政策 (non-intervention)，基本上與自由主義的精神銜接，對香港人的集體意識有很深的影響 (Lau and Kuan, 1990)。此外，自香港的九七回歸確定後，基於種種原因（如港英政府推動代議政制、民主抗共、本地精英對撤退中的港英政府留下的權力真空的爭逐等），香港亦出現了某種有限度的民主化過程 (Kuan and Lau, 1995)。當社會經濟上的自由主義與政治上的民主化逐漸匯合，自然會進一步強化、加深香港人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和肯定，從而或多或少會影響到香港人在後過渡期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⁷

無論如何，先讓我們回頭看看當前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狀況。

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

與過去的研究結果相似 (Lau and Kuan, 1988; Lau, 1992; Lee and Leung, 1995)，我們的調查發現，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亦即是以香港人為本位的意識）相當強烈。表一顯示，有 88.6%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全賴香港人聰明努力」；有 80% 同意／十分同意「香港是最幸福的中國人社會」；有 79% 同意／十分同意

「香港的經濟是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從上述的數據中，顯而易見，香港人無論對香港人的族群「性格」、香港社會在中國人社會的地位和香港在世界經濟中的活力，均有極高的評價與肯定，族群自傲感甚強。尤其是香港人對其族群「性格」——聰明努力——的認同，更是高度一致，不認同的（不同意／十分不同意）僅有微不足道的 2.5%。

另一方面，雖然香港人表現出強烈的自我族群認同，但與此同時，他們對中國人的認同並不薄弱，儘管這中國人認同未必具有深刻的民族政治建構的內涵（有關這一點，下文將會有更多的論及）。我們的調查指出，有 87.8%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中國人勤奮上進，競爭力強」；有 76.3% 同意／十分同意「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文化悠長深厚，值得驕傲」；有 53.1% 同意／十分同意「中國已經發展起來，下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值得注意的是，單就上述的數據而言，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明顯偏重於民族性格（勤奮上進）及歷史文化的肯定，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信心，卻相對低落，尤其是比較於他們對香港在世界經濟中的活力的高度肯定，二者之間信心的強弱相當分明，究其原因，當然不排除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評估（如香港經濟確比中國大陸經濟好很多），但由中港兩地長期政治分離發展導致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的「親疏」或「近遠」之別，亦應有一定的影響。

表一：被訪者的香港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

	十分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十分 同意	不知道/ 不清楚
香港有今天的成就全賴香港人聰明努力	0.3	2.2	8.0	72.9	15.7	0.9
香港是最幸福的中國人社會	0.1	9.7	8.3	70.4	9.6	1.9
香港是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	0.2	7.0	8.1	71.4	7.6	5.7
中國人勤奮上進，競爭力強	4.4	7.4	0.0	77.8	10.0	0.4
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文化悠長深厚，值得驕傲	0.1	10.4	11.1	67.7	8.6	2.2
下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0.8	21.2	15.0	48.9	4.2	10.0
(N=1,556)						

此外，相關分析顯示（見表二），上述初步勾劃出的香港人自我族群認同和他們的中國人民族認同不僅沒有出現相互衝突否定的情況，而且所有指標之間均存在統計學上顯著（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的正關係，相關係數也有一定的強度，最強的一組是香港人的族群性格與中國人性格，高達 0.2935，最弱的一組是香港人的族群性格與下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但仍有 0.1509 之強。換言之，就上述選用的指標來說，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和他們的中國人認同基本上存在於某種相對和諧、互相促進的狀態，香港人認同的發展並不妨礙中國人認同的發展，甚至有助中國人認同的發展，相反亦然。

表二：被訪者的香港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的相關分析¹

	香港的成就 全賴香港人 聰明努力	香港是最 幸福的中 國人社會	香港是世 界最有活 力的經濟	中國人勤 奮上進， 競爭力強	中國地大 物博，文 化深厚， 值得驕傲
香港是最幸福 的中國人社會	.2637*				
香港是世界最 有活力的經濟	.1962*	.2244*			
中國人勤奮上 進，競爭力強	.2935*	.2176*	.2773*		
中國地大物 博，文化深 厚，值得驕傲	.2284*	.2145*	.2096*	.2825*	
下世紀是中國 人的世紀	.1509*	.1890*	.1678*	.1934*	.2830*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註：1. 表內所有指標之量度均由 1 = 「十分不同意」至 5 = 「十分同意」。

上述的分析畢竟只是靜態地觀察香港人的自我族群認同和中國人民族認同。在這二者之間，他們究竟如何取捨、如何定位呢？首先，當被問及當考慮到他們的身份時，他們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多些還是中國人多些時，有 36.3% 的被訪者回答中國人，回答香港人的有 49.0%，回答兩者都是有 11.2%，回答兩者都不是的有 0.5%，而回答不知道／不清楚的則有 3.0%。換言之，儘管在行將回歸中國前夕，認同香港的市民仍遠較認同中國的為多。不過，必須指出，相較於劉兆佳過去歷年的同類研究，認同香港的市民似乎已正在減少，而認同中國的則正在增多 (Lau, 1992:152)。⁸

當然，單是一般性地詢問香港人在其自我認同與中國人認同之間的定位，只能使我們對有關問題得出一個抽象的理解，要越過這抽象的理解，進一步把握其內在的具體複雜關係，還需要探討他們對此問題的各種相關看法。

表三臚列的正是被訪者對此問題的一些相關看法的結果，綜合之後，最少包含了如下的特點：

1. 香港人的族群本位意識遠比民族意識為強：有 67.5%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中國要發展，就要多學習香港，使中國香港化」，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17.8%；有 74.2%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當中國的利益與香港利益出現矛盾的時候，當然要站出來支持香港的利益」，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9.8%。這兩項態度明顯透露，大多數香港人對香港過去的發展感到相當優越、驕傲，並從這樣的立場看中國未來的發展，因此才會持「中國應香港化」的態度。相信也因為這種強烈香港本位意識的影響，他們才會將香港利益擺放在高於中國利益的位階。

2. 香港人雖然自我族群本位意識強烈，但現代民族意識和國家主權意識仍頗為清晰：有 67.7%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中國的問題，包括港澳問題和台灣問題，是中國人的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不應該找外國人幫忙」；有 57.2% 同意／十分同意「中國派解放軍進駐香港是必須的，因為不如此做便不能夠體現中國在香港的主權」；有 50.5% 同意／十分同意「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不應該擁有雙重國籍」。國家內政不應訴諸外力、領土駐軍、單一國籍理念等均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流價值，過半數的香港人既認同這些價值，多少顯示他們的自我族群認同並沒有完全模糊他們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須知道，若單從現實主義或族群本位的角度考慮同樣的問題，結果很可能並不一樣，特別是像解

放軍駐港、單一國籍等問題，均曾在香港造成巨大的爭議。由此可以猜測，在考慮上述的問題時，民族認同應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3. 香港人頗願意幫助中國的民族發展：有 57.8%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爲了國家的富強，個人利益有時應該放開一邊」，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21%；有 42.8% 同意／十分同意「香港如果有財政盈餘，應該撥一部份給中國政府發展大陸」，雖然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也有 39.7%。表面上，這一點似乎與上述第一點存有一定的矛盾：既然第一點指出，大多數香港人將香港利益的位階凌駕於中國利益之上，又怎會願意真心幫助中國的民族發展呢？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點強調的是香港利益與中國利益出現矛盾時香港人的自我族群利益傾向性，但問題是，這種自我族群利益的傾向性既不是香港人所特有，在其他民族國家亦經常出現，也不一定意味對民族利益的否定。後者的理由很簡單，族群利益與民族利益並非必然存在於矛盾的狀況，因此之故，香港人在強調自身族群利益的同時，自然可在其他方面幫助中國的民族發展。

4. 香港人頗願意加強民族教育：有 89.0%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要做好中國人的本份，便應該多認識中國過去的歷史與文化」；有 82.1% 同意／十分同意「爲了民族成員間的溝通方便，香港人應該努力學習普通話」；有 53.8% 同意／十分同意「身爲中國人，當然要學會唱國歌」，儘管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被訪者也有 32.8%。在這三種態度中，香港人對歷史文化教育和國語教育的肯定幾乎是毫無異議，這印證了早前的發現：香港人的中國民族認同以歷史文化爲主要內容。相比之下，香港人對唱「國歌」所表現的疑慮，多少反映出他們對其民族認同中的政治建構——中華人民共

和國——所存在的一定疏離甚至抗拒，原因是唱國歌是現代民族認同的一種直接表現和實踐，國歌象徵民族和國家。不過，香港人在這方面表現出的矛盾其實也可以理解，正如前面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建構過程，很大程度是在他們的現實經驗之外，因此對唱其國歌產生某種排拒，也是人之常情；相反，香港既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香港人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自然可不知不覺地於日常生活中濡染形成。

表三：被訪者的香港人認同定位與中國人認同定位（%）

	十分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十分 同意	不知道/ 不清楚
中國人不應擁有 雙重國籍	1.5	31.0	8.2	45.2	5.3	8.8
個人利益有時應 從屬國家利益	0.6	20.4	13.3	54.1	3.7	7.9
中國人應會唱 國歌	1.2	31.6	10.1	49.0	4.8	3.2
香港人應學習普 通話	0.2	9.5	7.2	71.6	10.5	1.1
香港應財政資助 大陸	2.6	37.1	9.8	40.7	2.1	7.8
解放軍駐港體現 主權	1.7	25.3	9.8	52.8	4.4	6.0
中國人問題應由 自己解決	0.9	17.3	7.8	57.8	9.9	6.3
中國人應多認識 中國歷史文化	0.3	5.0	3.8	78.4	10.6	1.9
中國應香港化	0.6	17.2	10.9	60.6	6.9	3.8
香港利益高於中 國利益	0.3	9.5	8.9	65.7	8.5	7.1